

## 第四章 離散談論與海外藏族

本章將透過離散談論的分析而重新探討海外藏族的特殊狀況。首先，我將對離散談論的發展與轉變做一個探討與回顧，再來，將離散談論的不同的層面運用在海外藏族的例子之上。第二節中，透過不同的離散民族如旁遮普錫克教徒與厄立特里亞人等加以比較，這種比較分析的過程當中，希望可以突顯出更深層的意義。最後，第三節的部份將探討達蘭薩拉在海外藏族的跨國性的網路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認為對於海外藏族文化研究這方面，離散談論提供了新鮮的視野與研究方向，並且有遠觀的描繪海外藏族文化將來發展的途徑。

### 第一節 海外藏族與離散理論

離散(Diaspora)這一字的字根來自於古希臘文的分散，最早被使用來描述被迫離開家鄉的猶太人與早期的基督徒，按照原來的用法，離散表示屠殺與驅逐等暴力所造成的族群分散，並且也意味著被害的族群在異國的環境中維持了獨特的認同。到了十七世紀的時候，離散這個名稱被神學家延伸到其他的宗教團體之上，亞美尼亞人與巴勒斯坦人等團體被描述為離散群體，這兩個例子與猶太人的大流散之間有許多共同點，例如共同的宗教、語言與對被迫移居的共同記憶。後來民族學家發展出來的離散理論是根據這種原來的涵義被發展出來，不過在當代民族學的談論之中，離散有著更廣泛的意義，曾經被稱為移民、流亡(exilic)與難民的族群如今以離散理論被加以討論與分析；另外，一些並沒有被迫離開他們的故鄉，但仍然維持共同認同的群體開始使用離散這名稱來描述自己，這樣一來，離散涵義不像以前這麼明確，在現代的談論之中，離散不只是一種被害的負面狀態，對被邊緣化的民族來講，離散也可以提供活力化(empowerment)的機會。

1980 年代以來，離散的名稱經常被用作聯繫，另一方面，離散被海外藏族的學者用來描述自己的民族。在於James Clifford寫的有關離散論理論的經典文章之中，他指出偏向離散認同的主動經常源自於本民族之中，據Clifford之說，許多原來將自己的困境視為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之間的權利奮鬥之族群已經轉向另外一種的認同，離散談論已經不再著重於無能力、渴望、流亡等負面狀態，如今離散也意味著國際動員的能力，這樣離散提供另外一種選擇給弱勢民族。<sup>1</sup>有趣的是，當學者與其他的觀察者提倡離散中的活力化與動員化等正面的層面<sup>2</sup>，

<sup>1</sup>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1994): 311.

<sup>2</sup> 在外國的協助之下，海外藏族已經建立了一個擴國性的國際網絡，這個網絡的確達到了深遠的影響力。

離散原來的負面涵義也符合海外藏族特有的國族主義認同—返回故鄉的渴望、遭受共同的敵人被迫離開故鄉。如此的情況之下，在海外藏族的特例之中，離散理論的使用帶來了含糊不清的意義。

海外藏族與藏學界使用離散這個名稱之前，其經過長期的概念化過程，這樣以來，離散已經變成了一個既複雜又多元的理論體系<sup>3</sup>；在一篇有關海外藏族離散之中，Anand指出在藏族的案例之中，離散這個概念的使用經常沒有受到理論分析的交代，這樣，離散僅是流亡、難民或其他名詞的替代詞而已，而且對海外藏族文化並沒有提供實質的貢獻。<sup>4</sup>另一方面，即使沒有預先釐清離散的涵義，這一詞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以追求實際利益為意圖的文化形象(如環保主義與和平主義等)。因此將離散這個名稱套用到海外藏族的情況之上以前，我們必須先進一步了解該詞的涵義，這樣，離散理論才能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分析架構。接下來的幾頁中，讓我們先來簡略地回溯離散理論的發展之後，再來討論這種理論對海外藏族文化研究的使用性。

### 一、離散的談論

不管怎樣離散討論的使用已經很廣泛，對這種現象Clifford指出，這詞彙已經擴散到全球各個地區，離散談論的普及化背後有許多因素，譬如，非殖民地化，移居地增加、全球化的交流與交通等等；這種種現象鼓勵單一國家之內與跨國界的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繫、居住與旅行。<sup>5</sup>Clifford提到這種種的因素都造成了嶄新文化現象的誕生，人與人之間能夠橫越很遠的距離且跨越國界維持聯繫，這樣以來，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群體有機會維持共同的文化傳統，隨著交通與交流科技的發展之下，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可透過各種的策略凝聚團體力量。現代化所帶來的變化也造成學術上的轉變，針對這個問題，1991年時，*Diaspora*期刊第一版的編輯Khachig Tololyan提到，「對分散的學術談論在轉變，在人文科學之中，學術毅然地轉向離散…最近被分散的群體被重新命名為離散群體，1960年代末期之前，這些群體被稱為流亡社區、海外社區、民族或者種族的少數民族等等，這種現象造成了離散群體的增加，而且也擴大了離散這個名稱在語意學上的涵義範圍」。<sup>6</sup>

在離散談論的普及化這種趨勢之下，多數的學者對於離散並沒有下很清楚的定義，這樣以來，Tololyan認為該詞彙，「處於變成一種混雜與鬆散的類別之危險狀態」<sup>7</sup>，在這方面Robin Cohen指出在現代的使用中，任何離開原來故鄉的團體被放在離散的範圍之中，Cohen認為這種用法之下，離散僅是指示國際遷移人口增加的結果而已，如果不將離散加以理論化，分析範圍與界線將會變得無法確

<sup>3</sup> 1991 創立的期刊*Diaspora*專心致志這方面的研究。

<sup>4</sup> Dibyesh Anand, "A Contemporary Study of "Diaspora": The Tibetan Version," *Diaspora* 12.2 (2003): 211.

<sup>5</sup> Clifford, 308.

<sup>6</sup> Khachig Tololyan, "Rethinking Diaspora," *Diaspora* 1 (1991): 3.

<sup>7</sup> *Ibid.*, 8.

定。<sup>8</sup>

從 1980 年代以來，許多學者在重新探討這個辭彙的意義，William Saffran 提出了如下的幾個重要特徵：

- 一、分散到兩個地區以上
- 二、對故鄉的共同神話
- 三、疏遠(alienation)於故鄉
- 四、返回故鄉的理想化
- 五、與故鄉之間的持續性的聯繫<sup>9</sup>

其他的學者也提出了各自的特徵清單，譬如Robin Cohen的清單另外加進長期維持共同的民族認同這個特徵。<sup>10</sup>

另外一個離散學者Kim Butler認為各個離散學者似乎對三個主要的特徵達到了共識。第一、分散到兩個地區以上，按照離散希臘文的字義跟它意味者疏散與分布，這樣，該群體必須被分散到兩個地方以上，而不是從故鄉遷移到一個特定的地點，被分散到許多個地方才能發展出各個地方之間的聯繫，各個地區之間所建立的網絡構成了離散與不同的遷移形式之間的差別。第二、與故鄉擁有想像中或者證實的聯繫，不管這種聯繫的性質是想像或是實際，故鄉與遷移群體之間的聯繫或是離散意識發展的根據。第三、群體認同的延續，離散群體對於他們的身分必定有自覺的認同感。除了這三個以外Butler又增加第四種特徵：離散的情境必須被維持至少兩代；即使該群體在一代以內能夠返回原來的故鄉，這叫做短暫流亡而不是離散，離散這個詞意味者長期分散的狀況。<sup>11</sup>

值得提及的是，Butler 對於離散的定義與原本使用在猶太人例子上的涵義比較，Butler 對於離散的概念比較寬闊，她並不強調被害、疏遠與返回故鄉的渴望等特徵為離散的必要條件，基本上任何擴散到兩個地方以上、維持聯繫與獨特認同的群體都被歸納為離散的範圍之內。

對離散的分類與定義有助於集中與限制分析的範圍，但是Clifford<sup>12</sup>，提出如下的警告，在下定義時，不必太執著於「理想模範」(ideal type)<sup>13</sup>，連這些恰好符合於離散理論中的各個特徵的群體，假如仔細的分析一下都可以找得到內部的矛盾點與對立，上面幾章對海外藏族的討論顯示民族認同之中存有許多不同的層次，具有堅定地返回故鄉的目的論這種群體，在表面之下可能存在多種層次的聲音，再說，時間與空間的轉移之下，由於各種的因素如障礙、機會、對抗或聯繫

<sup>8</sup>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159.

<sup>9</sup> William Saf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y: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 (1991): 83-84.

<sup>10</sup> Cohen, 180.

<sup>11</sup> Kim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s,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10.2 (2001): 192.

<sup>12</sup> Clifford 1994 年寫的文章是現代離散談論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sup>13</sup> Clifford, 306.

等等，離散的概念可能會不時地增加或降低。

最近十幾年以來，學術談論強調了離散認同的負面性與正面性，離散原來以受害的經驗為啓發，但是這種對共同受害的記憶卻提供超越弱勢地位的奇蹟，按照Clifford的說法，當離散群體在異國環境之中受到當地人的歧視與排斥時，離散正面的層面浮現了，離散群體可以超出該國家的規範所帶來的限制，換句話來講，在特定國家的社會環境之中，離散群體特有的共同記憶與跨國性的聯繫提供了特殊的機會，國家壟斷的領土與環境被離散群體的聯繫穿越，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當中，跨國聯繫的成員身分提供心理與物質上的協助<sup>14</sup>，在如此情況之下，不能以直線同化理論看待離散群體的文化適應，他們並不是單純的移民團體，並且又不是一般的少數民族，因為離散認同對他們的適應過程造成了持續性的影響，Cohen則強調離散認同創造性的層面，在容忍度比較高的國家之中，離散群體有機會獲得「獨特、有創造與富裕的生活」<sup>15</sup>，而且離散情境的普及化之下，對民族國家與傳統宗教的忠誠與認同，將來可能轉向另一個焦點。<sup>16</sup>

總之離散談論針對各種移民團體跨國性的認同加以分析，離散群體在接觸異國文化的同時，他們刻意維持自己特有的認同，在這種過程當中，多樣性複雜、及跨國的形式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結果新興的文化與不同文化之間的形式挑戰了民族學者對文化與國家的詮釋，離散談論的發展之下，文化不能視為特定地區的現象，人口的遷移及其隨後發展出來的離散認同不斷地受到歷史、文化與權力支配的影響，這種過程之下，我們可以看得到空間並不是固定的，而是社會創造出來的產物，這樣以來在全球的離散群體之中，包括海外藏族在內，獨特的民族與文化認同及對故鄉的美夢的確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 二、海外藏族的實例

藏族遊居海外的經驗被藏族本身與外來的學者描述為流亡或者難民的狀態，1990 年中期以來，在海外藏族的特例中，離散這樣的名稱也變成常用語。離散一詞在 1984 時最早出現在Margaret Nowak針對在印度出生的藏族之研究中，這是我能找到藏學界中最早使用離散的例子，在隔了十一年之後，1995 年時，國際藏學協會舉辦了一次稱為「離散中的藏族文化」(Tibetan Culture in the Diaspora) 的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中的研究離散被使用來分析認同的分裂與重建<sup>17</sup>、混雜現象(hybridity)與創造性的適應等等，這種研究落在現代離散談論的範圍之中，自從這次研討會以來，離散一詞的使用越來越盛行，筆者看到 1990 年代末期至今出來的針對海外藏族的西方研究之中，大部份的學者以離散這個名稱形容海外藏族(The Tibetan Diaspora)，海外藏族的菁英也使用該詞形容自己的社會<sup>18</sup>，不過，如以上所提，大部分的學者並沒有考量到離散的涵義。

<sup>14</sup> Ibid., 307.

<sup>15</sup> Cohen, 180.

<sup>16</sup> Ibid., 196.

<sup>17</sup> 在本論文的第一章，我已經討論過這次研討會中的幾個研究。

<sup>18</sup> 參看，Exile as Challenge: the Tibetan Diaspora, eds. Bernstorff Dagmar & Hubertus Von Welck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3).

海外藏族仍然維持返回西藏的渴望(實際或者想像中)，獨特民族認同的維護也是海外藏族社會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流亡到南亞之後，藏族被分散到印度次大陸各地，其後許多藏族已經到世界各國建立藏族社區；在制度性的層面，流亡政府致力於維持分散到各地的藏族之間的聯繫，而且在個人層面，海外藏族透過電話、網路、國際旅行、物品交換與匯款等方式維持緊密的聯繫。以上這種簡略的敘述就可以證明海外藏族的流亡經驗合適於離散的各種定義，不管是傳統針對猶太人的概念或著較為靈活的現代詮釋。

一方面，傳統的離散概念非常適合使用於海外藏族的實例之上，雖然在實際的發展之下，海外藏族返回西藏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返回的目的論與被害的共同經驗還是很突出，另一方面，海外藏族的經驗也能突顯出被 Clifford 與 Cohen 等學者強調的正面與超越性的層面，這四十幾年以來，藏族建立了跨國性的經濟與文化網絡，這種網絡有效地凝聚全球各地藏族的力量，並且有助於獨特民族認同的維護與發展。

採用離散理論針對這些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的藏族進行研究的學者偏向於現代離散談論，而不是傳統猶太人的例子，考慮到海外藏族與猶太人之間的相似性，這是一種奇特的現象<sup>19</sup>，學者對於離散談論中的創造性與超越性的層面重視顯示研究興趣的轉變，本論文的第一章中，我已經提到了這點，學者對於搶救一個正在消失當中的文化被對於創新、適應與生存的研究興趣所取代。

在不同傾向的離散理論之中，我們可以發現過去的受害、現在的適應與對未來的途徑之間的衝突，這三者之間的對立也提供了一個探討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之架構，本論文中不斷地在強調自從 1959 年以來，傳統文化的保存和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是海外藏族認同的重要概念，這代表著一種面向過去的保守主義，然而，連最僵硬的保守傾向無法將一個民族的意志與共同的歷史捆綁起來，想像的過去必然有未來持續生存的空間，Venturino 如下的敘述將這種衝突突顯出來：

對於許多離散的藏族來講，國族的想像不僅是最後的結果，反而，藏族的國族主義就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對部分的藏族來說這就是獨立，對另一部份的人這便是實質的自治。我認為離散的藏族社會重視雙重的意志 (dual intentionality)，一方面是取回故鄉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改善全球人類精神狀況的任務。<sup>20</sup>

海外藏族的國族性以過去為根據，不過所謂的「雙重意志」指向未來的途徑，對許多海外藏族來講，藏族文化、宗教與政治運動的宣傳不僅僅對海外藏族自己本

---

<sup>19</sup> 藏族與猶太人之間的相似性並不是完全被忽略，有關達賴喇嘛與猶太教的領導者之間的談會參看， Roger Kamenetz, *The Jewel and the Lotus: A Poet's rediscovery of Jewish Identity in Buddhist India*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5).

<sup>20</sup> Steven Venturino, "Reading Negotiations in the Tibetan Diaspora," in *Constructio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Frank Korom (Quebec: World Heritage Press, 1997): 103.

身有利，而是有潛力將精神上的指導提供給全球的人。談到海外印人與印度教這方面，Cohen提到，「透過更新與傳教某些宗教呈現“世界”或者“全球”宗教的性質」<sup>21</sup>，在這種過程當中，「宗教可以提供額外的力量和離散的意識」<sup>22</sup>，藏傳佛教是這種現象的另一個恰當的例子，透過在一個環境中的重建與向外傳教的過程，海外藏族製造了一個未來的途徑，換言之，持續性保存與發展的空間；很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藏族的特例中，藏族文化與政治運動的宣傳這種現象運作在等同的意義範圍內，在許多外國人的印象中，藏族宗教與文化同樣地都有靈性的特質。<sup>23</sup>這四十幾年以來，在南亞的藏族社會中，對於政治的行動主義被培養出來，這種概念也被藏族的移民帶到其他的國家去，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愛國行動與藏族認同之間的聯繫，對部分的藏族來說，對政治議題的熱情也許在降溫當中，但是這種思想的架構並沒有被拆除掉，分散到世界各地藏族的年輕一代仍然被社會化成向外國人推廣藏族運動的行動份子，在這種情況之下，文化宣傳提了另一種的途徑好讓海外藏族表示他們的獨特性。

Clifford指出，「在活生生的對立當中，離散文化調解於分離與糾結之間，並且調解於當下的生活與過去的記憶之間，這樣離散意識可以將悲慘的條件加以充分利用」。<sup>24</sup>以上這句話非常適合描述海外藏族的特例，流亡經驗的喪失與異國環境中生存的毅力同時存在，對於過去的慾望與對未來的夢想不斷地在對話當中，海外藏族的離散認同以過去的受害為根據，不過，未來發展的途徑正在浮現當中。

## 第二節 離散民族之比較分析

將其他的離散民族與海外藏族進行比較分析，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文化變遷與適應的趨勢。觀看全球各種被分散且跨國性的民族，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的特例，部分的民族善於尋找跨國性的經濟機會且沒有返回故鄉的渴望，他們所建立的跨國性的社會既有別於他們的舊家，又有別於新家，也有許多民族比較符合離散較為狹窄的定義，他們認為分散與遷移是短暫性的狀態且是未來設法返回故鄉的機會，許多這種民族維持了國族主義的野心，在建立跨國性的聯繫之同時，他期望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然而，在異國的環境中，對未來的期望是易變的，許多人在新的國度同時會尋找生根的機會，看得出來，離散民族必須面臨許多複雜的因素，這樣一來，他們在未來所選擇的途徑很多樣化。上面的幾章中，本論文已經顯示過海外藏族的國際遷移與流動不斷地在增加中，這種現象動搖了達蘭薩拉的藏族社會，而且向外國遷移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因此，在接下來的幾

---

<sup>21</sup> Cohen, 188.

<sup>22</sup> Cohen, 189.

<sup>23</sup> 這種現象與達賴喇嘛的國際形象相關，他的形象有效地將政治、文化與宗教連結在一起，在很多的印象中，藏族文化不同的層面分不開來。

<sup>24</sup> Clifford, 309.

頁中，爲了更了解海外藏族當時的情境與未來的途徑，我將會針對於另外兩個特例加以分析：旁遮普的錫克教徒與東北非的厄立特里亞人。

### 一、旁遮普的錫克教徒

1947年時，印度次大陸分裂成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國，這時候以來，旁遮普的範圍被分成兩個不同的國家，宗教之間的衝突造成大量的遷移過程。這樣一來，按照宗教信仰可以區分爲不同旁遮普的群體，然而，印度之內的旁遮普仍然有印度教與錫克教徒之分，1940年代初期，印度的錫克教政黨設法將卡里斯坦(Khalistan)建立成錫克教獨有地區，不過在印度獨立之後，這個地區並沒有被建立；從此之後，印度錫克教徒的民族主義運動就開始形成，至今以卡里斯坦爲名的暴力造成了數不盡的人喪命。<sup>25</sup>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的傳統文化圈同樣落在不同的國家之中，如中國、尼泊爾與印度；但是在海外藏族的國族認同中，這些原來居住在近代中共邊界以外的人並沒有被視爲藏族(bodpa)，這樣，我們可以看出來，海外藏族與印度錫克教徒的國族主義同樣是一種對於更廣泛建國過程的反應。至今許多分散到全球各地的錫克教徒維持了卡里斯坦的民族運動。

如同藏傳佛教一樣，錫克教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現象，其內部有許多分歧，儘管如此，旁遮普的錫克教徒的民族認同以共同的宗教文化爲中心。<sup>26</sup>至今，全球錫克教徒人口爲兩千萬人，一千七百萬個錫克教徒居住在印度，剩下三百多萬人分散在北美洲、非洲、東亞、東南亞、澳洲、紐西蘭與歐洲等地<sup>27</sup>，這樣看來，居住在西藏內地以外的十幾萬個海外藏族似乎無足輕重，幸好海外藏族的國際形象遠超出其人口比例。

1857年印度人對大英帝國的叛亂(the Mutiny)中，旁遮普的錫克教徒沒有參與暴亂；因此，在英國的殖民制度下，他們享有優等的地位，這是錫克教徒區別於其他印度群體的重要因素，在英國的殖民體系之中，他們到了其他殖民地建立社區，而且許多旁遮普的錫克教徒到英國尋找機會，隨後他們的網絡也漸漸地擴散到歐洲與北美等地。<sup>28</sup>

將錫克教徒與他族區分最爲明顯的特徵就是男人留鬍子與戴頭巾的習慣，對於錫克教徒與外人而言，這種依照性別“大男人”的打扮代表所有的錫克教徒且具有重要象徵性的意義，卡里斯坦的民族運動與這種大男人的談論息息相關。按照Axel的說法，最近幾年以來，提倡卡里斯坦運動的網站宣傳錫克教徒人被印度警察虐待的畫面。一方面，這種畫面有助於刺激民族主義的認同；另一方面，男人被虐待的畫面變成另一種以男性爲中心的民族象徵，這種畫面與海外藏族文

<sup>25</sup> 按照Brian Keith Axel的說法，錫克教激進份子與印度政府之間的鬥爭害了至少100,000人喪命，有關卡里斯坦這方面的討論，參看，Brian Keith Axel, “The Context of Diaspor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 (2004): 26-60.

<sup>26</sup> John Rex, “The Nature of Ethnicity in the Project of Migration,” in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eds. Guibernau I Berdun, M. Montserrat, John Rex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276.

<sup>27</sup> Axel, 33.

<sup>28</sup> Rex, 276.

化中達賴喇嘛所體現的非暴力與慈悲心的形象之間的落差很明顯，這種的差異性可以讓我們發現，形象與象徵對於民族運動的實際行動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除了外形的象徵以外，共同的宗教信仰、大家庭之間的聯繫與經濟交流等等，都是凝聚團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國家中發揮他們的專業與經驗的同時，旁遮普的錫克教徒維持與加強跨國性的經濟與文化聯繫。然而，John Rex認為分散到全球各國的錫克教徒打算繼續居住於國外繼續尋找更多的經濟機會，他們並沒有返回卡里斯坦國的意圖<sup>29</sup>，筆者認為這種現象與國際流動性息息相關，許多遊居國外的錫克教徒有經濟能力時常回印度探親。這樣一來，他們不會產生對故鄉的懷念與渴望，生活在西方國家的藏族也遇到同樣的情形，他們已經有能力回家探親，但有趣的是，對很多海外藏族來講，吸引他們回來不一定是西藏的老家，而是印度的海外藏族社區。

長期在異國的社會與政治制度進行交流與調節，必定造成了文化適應的現象，有關這方面，Rex說明了在英國長大的旁遮普錫克教徒的例子，這些年輕人在英國社會中，已經達到了教育、職業與專業方面成就，並且受到英國文化大量的影響，英國文化變成了他們自我認同中很重要的部份，但是他們個人成就以民族團體的團結性為基礎。再說，錫克教徒跨國界的團結網絡在將來會提供更多的機會給這些英國化的年輕人，儘管他們的民族認同已經不重視外形的象徵，透過民族網絡仍然可以享有許多優惠<sup>30</sup>；對於這種現象，Rex提出了如下的看法：「一個人可以利用兩個不同社會的成員身分，定居於國家的社會與跨國民族的社會」。<sup>31</sup>這種趨向在海外藏族社會也是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定居的藏族當中，但是達蘭薩拉藏族也可以利用不同層次的身分如難民、印度國民與跨國民族成員的身份來追求將來的機會。

## 二、厄立特里亞人

現代的離散談論重視在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特質，不過在厄立特里亞人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時代中，達到建國目的的離散民族的例子，然而，厄立特里亞人長期的武裝鬥爭與海外藏族的非暴力運動形成了對比，不過如同海外藏族的情形一樣，國際性的談論如人權與自覺等概念打造厄立特里亞人的民族運動之背景。而且相對於錫克教徒與海外藏族，厄立特里亞人的民族團結不是以共同宗教信仰為主，厄立特里亞的人口分成基督徒與回教徒，為了避免這兩個宗教團體之間的分歧，政治領袖強調文化與語言上的多元性，他們將厄立特里亞描述為一個具有九個獨特民族的多民族國家。<sup>32</sup>

在海外藏族的實例中，一個文化、宗教與語言上具有相似性的群體跟敵對的他族產生接觸與衝突的條件之下，民族意識則在異國環境中形成出來；反過來

<sup>29</sup> Ibid., 277.

<sup>30</sup> Ibid., 277.

<sup>31</sup> Ibid., 277.

<sup>32</sup> Victoria Bernal, "Eritrea Goes Global: Reflections on Nationalism in a Transnational Er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 (2004): 8.



看，厄立特里亞人民族意識的形成更令人難以想像，他們經過了長期被殖民的經驗，最早是義大利的殖民者，再來是英國人，最後是衣索比亞，經過這種長期的過程，文化、宗教與語言上不相似的群體變成了統一的國族，這個頗有代表性的例子顯示民族認同是偶然的、流動的與形成中的現象，並且也證明了共同的敵對對於民族認同的重要性。

厄立特里亞人第一次組織性的獨立運動是 1961 年開始的，後來贏得獨立的厄立特里亞人民解放陣線(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或EPLF是 1971 年時創立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外藏族獨立運動的對象是中共，EPLF的運動依照馬克思主義思想，而且他們曾受過中共的軍事訓練與協助。<sup>33</sup>在長期的鬥爭中，十幾萬個民眾參與了武裝的反抗，EPLF不時在被解放的地區進行了類似國家政府的行政工作，這樣他們不只是進行游擊運動，而且進行了建國的運動<sup>34</sup>，如同厄立特里亞獨立之前的EPLF一樣，海外藏族也建立一個類似國家政府體系，在受到印度政府肯定的情況之下，跟之前EPLF的情況比較，西流亡政府的運作頗為穩定。

最終，1991 年時，經過三十幾年的暴利鬥爭後，EPLF贏得了厄立特里亞的獨立，1993 年時，厄國公開宣佈獨立，受國際監督的公民投票壓倒性的贊成了獨立<sup>35</sup>，長期與衣索比亞的敵對關係有助於讓民族認同變得敏銳，這有別於海外藏族的情況，四十幾年以來，海外藏族與敵對的漢族並沒有直接接觸。

厄立特里亞長期的獨立運動一直受到被分散到世界各國厄立特里亞人的支持與貢獻，按照Bernel的說法，接近一百萬個人逃離了厄國，這是該國獨立時三分之一的人口，遠離戰線的厄立特里亞人透過匯款、募款與宣傳而積極地參與了獨立運動，經過共同的鬥爭，跨國性的聯繫被建立與加強。獨立之後，離散中的人仍然是厄國的一個重要的部份，透過法律上的架構，EPLF的範圍擴散到全球各地，換句話來講，厄國的政府設法將離散中的厄立特里亞人包含在本國的政治體系之中，厄國獨立後最早的法律之一指定，「有厄立特里亞起源的父親或母親在國內或是在國外所生育的後一代都是厄國的國民」。<sup>36</sup>居住在國外的厄立特里亞人透過匯款而踴躍支持他們的老家<sup>37</sup>，同樣，西藏流亡政府透過全球的代表處而設法包含分布在南亞以外的藏族在他們的政治體系之中，流亡政府也承認海外藏族的雙重國籍身分<sup>38</sup>，隨著國際遷移的增加，居住在先進國家的海外藏族寄回印度的匯款越來越重要，這便是流亡政府與藏族安置區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即使國際的協助在將來衰退，遊居先進國家的海外藏族將會提供較為穩定的協助網絡。

---

<sup>33</sup> Bernel, 8.

<sup>34</sup> Ibid., 10.

<sup>35</sup> Ibid., 10.

<sup>36</sup> 厄立特里亞公民投票委員會，1993 年；參看Bernel, 19.

<sup>37</sup> 按照Bernel的說法，國外的厄厄立特里亞人每年寄美金三點五億的匯款回家，1999 年時，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美金六點五億。

<sup>38</sup> Meredith Hess, "Statelessness and the State: Tibetan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Activism in the Transnational World,"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2 (2006): 84.

如同旁遮普錫克教徒一樣，在厄立特里亞人的實例中，網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橫跨全球的同胞可以進入民族的網際空間而共同追求民族的目標，這樣一來，網路促進了共同目的，而且也降低了內部的差異，對海外藏族而言，網路的使用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方面，網路是尋找資助與提倡政治運動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海外藏族可以透過網路搜尋有關本民族的訊息，而且可以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同胞維持親密的聯繫。

如上的討論顯示旁遮普錫克教徒、厄立特里亞人與海外藏族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對每一個群體而言，儘管他們原來的故鄉中有許多內部的複雜條件，這個故鄉仍是最基本的參照依據，從這樣的基礎出發，這三個群體都維持了跨國性的文化與經濟聯繫；再說，在每個例子當中，網路是維持這種聯繫的重要工具，分散的民族同胞尋找到了聚集與相處的空間。如同獨立前的厄立特里亞人一樣，海外藏族建立了一個類似國家政府的政治體系，並且設法包含分散到各國的海外藏族在這種體系之內，但是流亡政府不能依靠法律與軍力維持它的地位，反而必須繼續透過象徵與形象維持它的合法性，這樣海外藏族社會能否凝聚分散在先進國家的藏族之力量是未來發展的關鍵，儘管返回西藏的渴望在海外藏族社會中依然有一點聲望，但是像旁遮普錫克教徒繼續伸展到全球各地尋求經濟機會的這種趨勢，在海外藏族社會中越來越突顯。

以上的比較分析顯示，在進行比較的過程當中，可以萃取出很多深層的意義，不過這只是一個初步性的探究，將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更多的難題加以分析與比較；譬如，離散研究可以將形象的理想化與創造對於其他的離散群體造成了什麼影響加以比較，香格里拉般的神化對於「我族」與「他族」的認知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種研究在本論文的範圍之外，然而，有關海外藏族文化之中所產生的各種模式與過程應該被拿來與其它的離散群體的情境做比較。

### 第三章 達蘭薩拉--離散民族之首都

在印度話中，達蘭薩拉的意思是短暫的家或是避難所<sup>39</sup>，考量到海外藏族談論中對於暫時性與返回西藏的重視，達蘭薩拉這個名稱的意義很巧合，然而，當歷史性的義務與當代的機會產生對話時，新興的可能性將會浮現，從這種角度來看，暫時性不僅僅代表返回西藏的意圖，許多人去達蘭薩拉的目的並不是最後再返回原來的家，達蘭薩拉這個暫時性的避難所也提供了其他的機會：遷移到新的地方。

離散學者揣測經過長期的時間，離散意識的新中心會出現<sup>40</sup>，達蘭薩拉在海外藏族扮演的角色可以證明這個論點，過了四十幾年以來，達蘭薩拉演變成人、物品、訊息與形象的交流中心，在達蘭薩拉當地，有關藏族文化與認同來自於內

<sup>39</sup> Kim Diehl, *Echoes of Dharamsal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2.

<sup>40</sup> Cohen, 157.

外的各種談論被妥協、詮釋、扭曲與重新詮釋；換句話說，達蘭薩拉是向心性與離心性的力量之衝突地點，在達蘭薩拉這個交流站中，不同的文化與民族在短暫期間之內相處與接觸，形容這種接觸與交流最適當的詞彙是摻雜或混雜。

混雜這個詞彙在中文裡頭，帶有一絲負面性的言外之意，筆者並有這樣的意思，從離散談論的觀點看，混雜卻意味著創造力與創新的意義，Clifford曾指出，「分離所帶來的實踐不只是文化的轉變或延伸，反而對於文化有創造性的影響」<sup>41</sup>，從這個角度來看，在達蘭薩拉發展出來的新趨勢不一定代表藏族文化的衰退或消失，反而是當地藏族適應於嶄新的條件而發展出來的結果，換句話來講，達蘭薩拉藏族在開闊他們的視野當中，這樣一來，達蘭薩拉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保留區，而且是前往世界各地的起點。

第一章已經談過，有關海外藏族人口統計的可靠性不高，有關國際遷移人口這方面的數據也是如此，這個問題背後有很多因素，一方面，對於印度政府而言，不斷地從西藏逃到印度的人潮是一個高敏感度的政治問題，如上已經提過，新來的藏族沒有受到官方承認，但是他們仍可以透過非正式的管道留在印度，另外一方面，筆者在達蘭薩拉感受到前往西方國家的非法移民是一個頗為廣泛的現象，在這些因素之下，在南亞諸國與分散到其他國家的海外藏族人口難以揣測。

國家	海外藏族人口
印度	85,000
尼伯爾	14,000
不丹	1,600
瑞典	1,540
歐洲其他國家	640
北歐	110
日本	60
台灣	1,000
澳洲與紐西蘭	220

表 1 海外藏族的人口分布

資料來源：Planning Commision. *Tibetan Community in Exile: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Issues, 1998-2001*. Dharamsal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2003: 18.

以圖表 4 中的數據根據流亡政府 1998 年進行的人口調查結果，海外藏族總數根據「北美洲藏族需求的估計計畫」(The North American Tibetan Needs Assessment Project)的說法，2002 年時，大約一萬個藏族在北美洲定居，假如兩個調查的數據正確的話，1998 年至 2002 年這四年之間，大約三千個藏族移民到

<sup>41</sup> Clifford, 309.

北美洲，按照Frank Korom的說法，1995年時，北美洲只有兩千多個藏族<sup>42</sup>，再說，1991年美國與西藏再定居的計劃進行之前，北美的藏族不到一千。這些數據與其他的移民群體比較無足輕重，但在人口稀少的海外藏族社會中，這種數量相當的可觀；再說，如上所提，海外藏族移民其中來自達蘭薩拉的藏族超出於比例，總的來看，海外藏族社會中，向南亞外的國家遷移，尤其是北美的國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比起在南亞生活的藏族，在北美洲定居的海外藏族面臨不同的挑戰，一方面，在北美生活中藏族缺乏安置區社會提拱的各種制度性的社會基礎，例如藏族的教育、政治與宗教體系；另一方面，與人口密度較高的安置區比起來，在北美的藏族主要分散在不同的大都市中，另外一方面，到了北美後，藏族已經離開使用藏語的社會環境，這些因素，再加上北美洲物質與流行文化的吸引力之下，維持傳統文化保護的談論(更不用提外形的文化特徵)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北美國家成長的海外藏族如同在英國長大的旁遮普錫克教徒一樣，外形的文化特徵將來可能越來越淡薄<sup>43</sup>，在這種趨勢之下，以達賴喇嘛的普遍性談論及其西藏青年會的反主流談論為藏族文化的主要特徵，是維護文化邊際的重要策略。另一方面，北美藏族與在達蘭薩拉和其他安置區中的海外藏族維持親密的聯繫也是獨特藏族認同的延續之重要因素。

對於北美與歐洲的藏族來說，返回故鄉的渴望已經出現了新的層面，按照Hess的說法，在北美藏族社會中，返回印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經濟條件允許時，他們時常返回印度探親，按照Hess的說法，達賴喇嘛常常鼓勵住在北美與歐洲的年輕藏族返回印度的藏族安置區住幾年且對海外藏族社會提供貢獻<sup>44</sup>，筆者在達蘭薩拉時，遇到不少從北美與歐洲返回印度的海外藏族，其中一個長期住在瑞士的藏族說，「我回來達蘭薩拉尋找我的文化根源」，他的這句話讓我們看得出來，達蘭薩拉的藏族社會不僅是暫時性的避難，它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建立在暫時性的談論之上的深根柢固文化體系。

向外國遷移的趨勢日益增加之時，達蘭薩拉在整個海外藏族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而且這個小山莊的重要性有很多不同的層面；第一，如以上所提到，達蘭薩拉是分散到遠方的藏族回來尋根的朝聖地。第二方面、在南亞地區留下的藏族對未來的期望已經受到深厚的影響，對許多人而言，達蘭薩拉已經變成了前往西方國家的起點地，當地是與外國同情者接觸的最佳地點，而且是尋找移民到國外的最好之處，在安置區的經濟飽和與就業機會極有限的情況之下，不少年輕藏族被吸引到達蘭薩拉來。前一章已經提過，這方面的消息已經傳到西藏內地，移民到西方國家的機會吸引了許多人放棄在西藏內地的生活而進行跨越喜馬拉雅山的艱難旅程。第三方面，在建立跨國性的民族聯繫之中，在達蘭薩拉的

<sup>42</sup> Frank Korom, "Tibetans In Exile: A Euro-American Perspective," *Passages* 1.1(1995): 2.

<sup>43</sup> John Garfunkel, "Cultural Survival: the Home-School Connection for Tibetan Youth in North America," Tibetan Education Network at Global Sourc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nservancy for Tibetan Art and Culture, 2002: 47-61.

<sup>44</sup> Hess, 95.

制度性之基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流亡政府及其許多民間組織，如同厄立特里亞的政府一樣，流亡政府承認了雙國籍的身分，而且設法將分散到各國的藏族納入他們的政治體系之中<sup>45</sup>，海外藏族的民間組織也有國際性的影響範圍，譬如，其中最大的西藏青年協會在全球各地有許多分支，按照他們的官方網頁，全球已經建立了八十一個分部<sup>46</sup>，這種團體提供了分散到各地的海外藏族接觸與相處的機會，看得出來，達蘭薩拉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制度性的基礎在全球海外藏族網絡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美國與西藏再定居的計劃進行以來，流亡政府鼓勵在美國定居的海外藏族申請美國公民身分，這種的政策遠離於維持難民身分的傳統意識形態，流亡政府這種政策方針顯示海外藏族社會中的重要轉變，以原來的構想這種政策有利於海外藏族的政治運動，原來的設想之下，以美國公民身分的藏族對政治運動可以提供更多的貢獻，隨後，這種思想也牽連到印度海外藏族社會之中，按照這種新興的且具有權威性的談論，移民到西方國家的舉動被合理化，換句話來講，海外藏族到國外當文化大使時，同時可以在西方國家尋找物質生活提升的好機會，在這種趨勢之下，傳統文化規範被超越，從中發展出較為開放與混雜的文化詮釋更接近於現代的離散理論。

部分的海外藏族與外國的觀察者仍然維持比較傳統的概念，許多人認為向西方國家的大出走代表海外藏族社會的負面傾向，道德的衰退與國族主義的淡化等現象被認為是國際遷移產生的後果，儘管如此，與外國世界的接觸與對話提供一套新的機會體系，這種機會的吸引力難以抗拒。

走路經過達蘭薩拉藏族區中狹窄的街道時，這種趨勢的實際性非常的突顯，在達蘭薩拉網咖的數量比起賣印度奶茶的攤販更多，這些網咖中網路電話、線上即時訊息、網路攝影機等設備齊全，在達蘭薩拉看到海外藏族的年輕人上網跟他們住在外國的朋友無意間地閒談是非常普遍的畫面。

---

<sup>45</sup> 譬如，流亡政府的西藏人民議會中有來自北美與歐洲的議員，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參看， Amy Frechette 2006, "Statelessness and Power: Transnational Entitlements Among Tibetans in Exile in Kathmandu Nepal" (PhD diss., Harvard, 1997), 141.

<sup>46</sup> 參看西藏青年協會的英文網頁：[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http://www.tibetanyouthcongress.org)。